

# 我的一家

陶 承



I 252.4/8

# 我 的 一 家

陶 承 口 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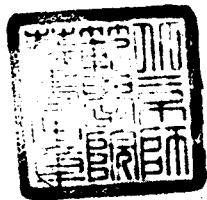
何家栋 赵 洁 执 笔



20709996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八 年 · 北 京



709996

封面设计：张志忠

**我的一家**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6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3 $\frac{1}{2}$  插页2

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 10019·1090 定价 0.24元

## 序 一

这本《我的一家》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。它反映着共产主义者不分男女大小均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。这是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的典型之一。毛主席的一家、蔡和森同志的一家及其他等等不可胜数的革命家庭，他们均具有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。

《我的一家》实例教育，激起人们对于反革命屠杀人民的异常愤怒、对于为人类谋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无限敬仰，由此更加强了我们的爱国热情。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我国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今日，我们必须发扬先烈们那种坚决勇敢舍身为国的英勇精神，这就是《我的一家》出版的现实意义。

徐特立

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

## 序 二

在延安，断断续续地听到陶承同志谈她的家，也听到一些同志谈她的儿子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时的机警的故事。现在，她把这些事写成书了。这是一本好书。不止是叙述了她的一家，而且通过她的书，可以看到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是何等的残暴和黑暗，看到工人阶级的儿女、贫苦的知识分子、共产党员为着推翻黑暗统治、解放被压迫阶级以至全人类，艰苦奋斗，前仆后继。丈夫倒下了，妻子更坚强起来；父亲倒下了，年轻的儿女更勇敢地跑上前线。这是何等的高贵品质！他们相信胜利，但并未计算及自身能看到胜利，他们知道胜利是要用血去换取的。

欧阳梅生同志，我只见过他一面，那是在他负责汉阳县委时的一次会议上。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，送《大江报》。我是当时《大江报》的编辑之一，环境恶劣，编报、印报、发报，都是单线。很遗憾，我没见过这位勇敢机警的少年斗士。

陶承同志没正式上过学，但曾从梅生同志学过诗。她说：梅生教书的那个地主家，园林很美。夜里，梅生改课卷，她在做针线，两人推窗一望，月色朦胧，树影池

光，苍翠欲滴。梅生念了几句诗：

夜静寻诗味，闲谈仔细评，  
共怜秋月老，山塘翠已深。

陶承同志说：当时的情景，确使我两人沉醉在自然的怀抱里。我还不懂诗，但诗的调子，至今记得，可能有记错了的字。这里，可以看到这一对青年夫妇是如何地热爱祖国的美好山河，想在这里面自由地劳动和生活。但是，当时的社会不允许他们这样，于是只好走上改造社会的路。

陶承同志说：一天她读《红楼梦》林黛玉葬花词，读到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，梅生在旁听着，流了泪。又过了若干年，梅生同志逝世好久了，我看到陶承同志写的孤燕诗：

梁上有孤燕，晨去暮归来。  
不知说何事，啜啜费我猜。  
玫瑰红朵朵，青春能几回？  
回忆当年事，犹然令人悲。

梅生、陶承都是贫苦的孤儿，对旧社会只有怨恨，没有留恋。他们真挚的爱情，发展而成为巩固革命斗志的纽带，因而培养出革命的后代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，我们一

方面聚歼胡宗南二十多万所谓精锐部队于边区山地，一方面开始在东北、华北进行大规模的解放战争，中央机关东移。陶承同志虽然在前几年的东征中失去了她可爱的最小的儿子，此时却心怀开朗了，写了几首《红云曲》：

朵朵红云直向东，荷花出水满池中。  
迎风娇艳清香意，白藕莲心味更浓。

朵朵红云直向东，黄河对岸炮轰轰。  
消灭刘戡几个旅，人民军队是英雄。

朵朵红云直向东，传来捷报喜重重。  
土改狂潮灭封建，南北东西正反攻。

母亲的情怀，比莲心还苦；革命的胜利，比花朵还香。陶承同志可以自慰了。

亲爱的读者们，男女青年同志们，陶承同志的家，不过是成千成万牺牲奋斗的革命家庭之一，她家牺牲的人不过是成千成万先烈英雄人物中之几。正是他们的血，取得了六亿人民的解放。我们常说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。这句话，在当时讲：一个人倒下去了，更多的人站起来，埋葬了伙伴的尸体，揩干了身上的血，立即又进入战斗；在现在讲：无数先烈的血，奠定了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、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

的道路，我们踏着这条路前进，应该更坚决，更勇敢，敢想、敢说、敢做，我们和流血的先烈，是心连着心的。

我们热爱和平，但是为着保卫祖国，反对压迫，我们的先烈不怕战争，我们也不怕战争。美帝国主义如果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，敢于阻挠我们解放自己的领土——台湾，我们一定要为反抗侵略而战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消灭侵略者。

牺牲的人民英雄，永垂不朽！

谢觉哉

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



我是个孤儿，从小不知有家，不知父母是谁，可是长到十七岁，忽然有个家了。

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六日。清早起来，干娘就忙坏了。给我梳头，插花，换衣裳——我要出嫁了。

这一天，正是我的生日。照家乡的习俗，过生日这天，是不能动荤腥的。这是表示不忘父母养育的恩情。可是偏选了这个日子叫我“过门”。干娘说：男方中了邪祟，病了几个月起不了床，急等着花轿上门“冲喜”呢！

家里并不象办喜事的样子，没有宾朋，也没有亲友，只有干娘一个人照料着我。亲属里只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舅舅。他成天背着小木箱，东游西串，没个固定的住处，因此把我寄养在邻居（也就是干娘）家里。此后，我就很少见到他了。我跟着干娘长大，干娘又送我去学刺绣，为我择婚。就是这几件嫁衣，也是干娘做的。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

“舅舅怎么还不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快了吧？”干娘说，“昨天就着人找他去了。”

忽然，笙管唢呐响了，迎娶的花轿到了门前。我慌了，心跳个不住。干娘一把抱住我，哭了。

我还没来得及哭，舅舅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，背起我就

跑。他身上有一股酒气，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喝醉了。

轿子里挺闷，头上又蒙着盖头，路上颠颠簸簸，把我搅得昏头胀脑。走了十多里，进了城，转进一条小巷，轿子停下来。以后就是繁琐的仪式：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坐床……我完全象个木头人，听人摆布。吃交杯茶的时候，有人送来了红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……我稀里糊涂的，连核也吞下去了。我偷偷看了一眼，新郎也吃了，还吐核哩！不知是谁嚷了一声：“新娘子笑了！”于是，屋子里顿时喧笑连天，有人跺脚，有人怪叫。

正在这时候，新郎摇晃了一下，两边的人赶忙扶住，才没有跌倒。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，嘴唇不住地哆嗦。不得不勉强结束仪式，叫人搀走了。

这一夜，我独自睡在陌生的新房里。

邪祟没有冲走，经一天的劳累，他的病更重了。

我的丈夫欧阳梅生，那时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，比我还小一岁。他也是自幼父母双亡，由祖母抚养大的。

过门不久，我就操持家务了。祖母治家很严，常为一点小事唠叨不休。我淘米的时候，偶而掉几粒米在地上，她也要拾起来，还嚷得四邻都能听见：“不能这样糟蹋呀！”火烧旺了，她又嚷：“这柴是钱买的呀！”我真怕她。

幸好梅生还体贴人，背地里总安慰我说：“祖母岁数大了，说你几句，不要见怪。你做你的，用不着怕。”可是他自己，在祖母跟前也不敢高声说话。

我们都还是毛孩子，贪玩，不懂事，祖母拘管的也紧。每日昏定晨省，问安三次。梅生下学回来，得先去请安，要是先进自己的卧室，她就生气。一生气就几天不理你。晚上，她坐在角落里，捻着一串佛珠，闭上眼睛，不声不响，象是参禅的样子。我们也只好陪她打坐，一动不动。

我真困了，打了个哈欠。

祖母睁开眼，狠狠瞪我一下，又入定了。

梅生趁这个机会，活跃起来，做出各种怪相，跟我传送消息；看我不懂，比划的就更起劲。后来连他自己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。

“轻薄！”祖母气哼哼地说，这回没有睁开眼睛。接着做个不耐烦的手势，那是叫我们走开。

我们一身轻快，就象遇到特赦的囚犯。可是还不等我们的脚踏出门槛，她又叫了：“不要点灯熬油哇！”

老人家虽然厉害，心眼倒挺好。高兴的时候，她把收藏的菱角、莲蓬、花生，拿给我们吃，并且感叹地说：“你们年轻人，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呵！”

第三年，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，起名立安。说来惭愧，我们还没脱尽稚气，却过早地做起父母来了。

小家伙好哭。一哭，就给吃奶。要不，就是梅生抱着他满屋子转。我们所能做到的，就是这些了。

最辛苦的还是老祖母，晚上顾不得再捻佛珠了。浆浆洗洗，都落在她头上。然而，她没有等到重孙子喊她一声“太

婆”，就一病不起；弥留的时候，她不住地摸着孩子的小腿。这大概是她对人生唯一的依恋吧！

祖母死了，我们的境况变坏了。她临终以前，曾特别嘱咐，请几个和尚来，给她念三天三夜金刚经，超度来世。在安葬的时候，我们虽卖掉那一小块土地和池塘，还是背了一身债。这身债务，以后也没有卸下来，因为接连又生了两个孩子。生下一个孩子，梅生就高兴地叫：“又多了一个债务人！”他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总是无忧无虑的。

从师范毕业以后，梅生便到外县教家馆去了。收入微薄，难以养家。我带着几个孩子，住在长沙城里，靠做手工，维持日常用度。

十三岁上，我在湖南有名的杨季堂湘绣馆学过两年湘绣。那时湘绣的主顾，多是官绅人家。一幅中堂，几扇条屏，多的要卖几十两银子。杨家手艺是家传，象人像的眼睛、动物的卷毛这些细活，总是放在内室，由他儿媳——十姨奶奶自己做，不传外人。她们绣出的眼睛，也真象会转动似的。我们学不到这些手艺，只做粗活。

说是粗活，也不简单。案前摆着布绷子，绷上绣件。缎子上虽然先由画师打好了图样，可是那只是个轮廓，自己还得按小图配线，绣出层次。一根丝线，要劈成十六根，每种颜色，从最深到最浅，又要分成十三种。所以绣一两针，就得换线。——我学了两年，连画稿也学会了。

现在，我又重新理起这些活计。在家里，绣不了大件，就给人绣些花边、领条、袖口，或是帐沿。做活的时候，把大

儿子立安放在床上，给他一本破旧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他能翻来覆去，翻看半天，不和大人纠缠。困了，就把画本一扔，自己睡了。

虽然清苦，可是我们倒过得挺快活。没有拌过嘴，没有吵过架。灯前月下，梅生兴致一来，还要吟几句诗呢。古人说：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但我们家却总是欢乐的。

## 二

一连数年，孩子一个挨着一个，我们的生活也一天不如一天。做手工，工钱低，一幅帐沿才两吊钱，到手就光。亏得那个好干娘，进一回城，就给些接济。不然，我们真得挨饿了。

不久，经朋友介绍，梅生到离长沙六十里的龙家大屋教书去了。全家也都跟着搬了去。

这里有山有水，树林子里，有好多叫得中听的鸟儿，路旁塘边，还有好吃的野果。孩子们简直入迷了，早晨爬起来，就满山遍野地跑。回来时，每个口袋里都装得鼓鼓的，野花，野果，石头，甲虫，什么都有。

龙家大屋前面有个锅底塘。塘边生着丛密的芦苇。那里蜻蜓最多，孩子们喜欢悄悄地溜过去，伸出两个指头，捏住蜻蜓的尾巴，再用线拴上，叫它满屋里飞。

孩子们很快迷上了这个开心的游戏。一天傍晚，下过

大雨，立安招呼弟弟妹妹说：

“走，去捉洋迷迷！”

孩子们跑到塘边，大哥眼明手快，伸手捏住一只。

“那边还有个大的！”老二应坚嚷着。

“捉住！”哥哥下了命令，伸手又捉住一只。

“我够不着！”弟弟胆小，脚边就是水塘，伸手试一试，不敢动。

“不怕，再往前一点！”哥哥一边命令一边行动，他已经捉到三只了。

扑通！……

“二哥掉到塘里了！”妹妹惊叫起来。

我用下针线就往外跑。只见塘边围了一群人，梅生也在那里。他见我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忙迎上来说：

“不要紧，救上来了。”

应坚浑身是水，鞋也丢了，一见我，就咧着嘴哭。我没好气，上去给他两巴掌。

“你还哭！没淹死还不便宜！”

“妈妈，莫打弟弟。”立安在一边说，“是我叫他去的！”

“那你也跑不了！”我又给他两巴掌。

我把孩子领回家，气还没消。顺手把他们拾回来的破破烂烂，都扔到院子里。梅生站在门旁，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真是昏官断案，有理无理，一律三百大板！”我心里一动，是有点过分了。

“你还在生气，可是挨淹的把这事早忘了！”梅生又说，

“你看应坚在做什么？”

应坚在院子的水坑边赶小鸭子。

“这证明你失败了。”梅生说，“应该给孩子讲通道理。”

“我没有那个耐心！”我说。

“耐心也是学的。”他说，“不然，就会专做蠢事。”

我无话可说了。

日子不断地过去。立安入了学。乡下生活要简省得多，吃水烧柴，都不用花钱；屋前屋后，种上些菜，也吃不完。因此，家里的生活宽裕些了。可是，梅生还不满意。

“不能光图眼前，光管自己。”他总这样说，“一个人还有社会责任，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。”

他需要什么呢？

一九二三年，他终于离开家，和几个朋友结伴到四川去办学校。他说要出去“见见世面”，寻找真理。我相信他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我没有拦阻他，自己带了几个孩子，又回到长沙。

谁知不到三年，他就逃了回来。学校被军阀封闭了，半路上遇见土匪，抢了个精光。到家的时候，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子。

“这回真是全军覆没了。”他一进屋就说，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接着把孩子一个个抱起来，亲着，胡子扎得他们哇哇叫。

他那模样，着实狼狈。身上满是灰土，一件短衫成了七零八落的片片。脸上白一块，黑一块，叫太阳晒得脱了皮。

就连他说话的声调也不一样了。

“梅生，你变多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他转过身，端详着我，“那末，我来看看你，变了没有。哎呀，还是那么丑！”

“你的心也变了！”我也玩笑地说。

“是变了。”他半真半假地说，“都交给革命了！你看吧，不要多久，这些军阀、地主，也得全军覆没。”

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。只觉得天下是要大变，压迫人的倒下去，受压迫的站起来。梅生先就变得厉害，早出晚归，连吃饭细嚼慢咽的习惯也变了，匆匆忙忙，好象总有事等着他。但是更重要的变化，我当时还不知道：原来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。

一天清早，我上街买菜，才出巷口，就被行人挡住了去路。踮起脚跟看：一队队工人、农民，还有学生，摇动着纸旗，喊着口号，向前涌去。墙壁上粘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，有的墨迹还没有干。一家商店门口，有个学生模样的人，站在桌子上，讲着什么。四周围了好多人。我挤到前面去，悄悄问旁人：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”他大声说，“革命军进城了！”

他边说边随着人群涌走了，看那神气，好象是怪我连这样大事都不知道。

我不由自主地随着人群向前走。

忽然又一支队伍涌了过来。人们匆忙地往两边让路。



几个拿梭镖的农民，押解着逃亡地主过去了。

我好不容易从人堆里挤了出来，竹筐子也挤碎了。定一定神，也不知是到了哪里。原来，不知不觉间，人群把我冲过了好几条街。天快晌午，菜市也收了。趁着人少些，连忙往家跑。老远就听见屋里孩子们哭闹成一片。

这一天，我怎么也安不下心来，做饭，饭糊了；烧菜，忘了放盐。头脑完全给搅乱了。耳边老是人声鼎沸，眼前老是旗子翻动。直到天黑，也不见梅生、立安回家，饭也等凉了。出门看看，老不见他们的影子。我哄孩子们睡了，坐在门外等。不久，立安一阵风似的闯进来。

“妈妈，快拿吃的，我饿坏了！”他嚷着，听得出来，嗓子是哑的。

“不饿你还不回来呢！”

“妈妈，你生气了，是吗？”他要辩解什么，就会把人缠个不休，“我去开会了，不是贪玩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！”我打断了他，“快吃吧，你又不饿了？”

“你要生气，我就不吃。”他也不让步，“妈妈，你知道，我还上台讲话了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，人真是多！……”

“开什么会？”

“欢迎北伐军！”他就象是个大人，“就是革命了。北伐军一来，就象爸爸说过的，再不许压迫人，穷人都有饭吃。……”

是这么回事呵！我忽然觉得有一肚子话，要问梅生。可是，这一夜，他没有回来。